

学术之旅

李宇明

壹

1978 年春天, 我作为高考制度恢复的第一届大学生, 带着文学的梦想迈进了郑州大学中文系的门槛。当时, 中文系主任张静教授正组织全国的一些语言学专家编写《现代汉语》教材。在教材编写协作会上, 一些专家被邀来给我们作学术讲演。其时, 统治语言学界达半个世纪之久的结构主义, 已早被乔姆斯基从语言学霸主的宝座上赶了下来, 但在中国, 作为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分支的美国描写语言学, 还处在引进阶段, 语言学界正尝试借用层次分析法来分析汉语。所以, 专家们讲演的热点也是美国描写语言学的分布理论和层次分析, 层次分析法同成分分析法比较所显示的优越性, 以及层次分析法处理汉语所遇到的麻烦……。由于缺乏国外语言学的常识, 对这些新东西都听不大懂, 但仍然很有兴致地去听, 对专家们指出的用层次分析法处理汉语所遇到的麻烦, 尤感兴趣。我幻想着自己能解决这些麻烦。

幻想是人生的动力。我开始喜欢很多同学都认为枯燥的现代汉语课, 并试图动手写论文, 但绞尽脑汁也写不出来。大学二年级时, 系里组织了一次专科考试竞赛, 我参加了现代汉语竞赛, 竟得了个第一名, 奖品是一支钢笔。就是这一次竞赛, 使我放弃了文学梦想, 把我引入语言学的殿堂中。

泡在图书馆读语言学的书成了我最主要的功课, 有四个寒暑假都是在图书馆度过的。开始时, 找些语言学的教课书看, 但教科书看不上几本就没有意思了, 因为面目都比较接近。于是转而找专著读。那时, 图书馆里开放的语言学类图书很少, 许多书都被尘封在书库里。记得当时看过《马氏文通》, 王力先生的《中国现代语法》和《汉语史稿》, 吕叔湘先生的《中国语法要略》等。后来又翻阅杂志, 《中国语文》对我的影响最大, 从它那里, 我了解到了中国语言学界曾经研究了些什么问题, 知道了论文写作的一般格式, 并朦朦胧胧地感受到中国语言学正在发生一场重大变革。

一边读书, 一边动手写点文章。读是外在知识的“内化”, 写既是创造, 也是知识内化的催化剂。对写得满意的文章, 就呈给老师看, 或投给杂志, 我自诩为是“拜杂志为师, 向杂志学习”。投给杂志的文章, 虽然多数是“水牛入海无消息”, 但也偶尔能得到回音。例如, 《所谓名词词头“有”新议》这篇论述古代汉语名词前加“有”表“定指”的文章, 就得到了《中州学刊》卢甲文先生的指教, 并于 1982 年在该刊第 3 期上发表。《试论“名物化”问题》曾接到《中国语文》备用稿通知, 虽然后来并未刊用, 但却构成了我七年后发表的《所谓的“名物化”现象新解》(《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6 年第 3 期) 这篇论文的基础。

大学是我学术旅程的出发点。回想起我的大学生活, 总觉得, 课堂学习虽然很重要, 但不能把自己封闭在教科书中, 要多读学术专著和学术论文, 并要动手做点科学研究。

贰

1982 年春, 我应届考入华中师范大学, 攻读现代汉语专业硕士学位。导师邢福义先生曾用隶书给我们师兄题了八个字: “抬头是山, 路在脚下。”这八个字也是现在华中师范大学语言学研究所的所训。先生解释: “一个有作为的人, 眼睛要看着山, 心里要想着爬山。但是, 上山的路要靠自己一步一个脚印地去走, 一步一个脚印地去踩开。山顶不易攀登, 成功不靠侥幸。”(邢福义

《语法问题思索集》第 341 页，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5 年）。学术上，邢福义先生向以务实著称，强调把研究植根于汉语的“泥土”里，强调理论生发于事实，提倡建立自己的“学术根据地”。

邢福义先生给我们授课，很少系统地讲语言学的知识。入师门不久，邢先生带来 30 余张经过筛选的语言卡片，指导我们对这些卡片进行归类，并从中发现语法规律，训练分析语法事实、总结语法规律的能力。此后，又把谌容的短篇小说《彩色宽银幕故事片》（《小说月报》1982 年第 10 期）复印给我们，让我们从中观察哪些语言现象可以进行深入分析，并拟出若干个可作论文的题目，训练语言观察的敏感性。然后，要求我们根据自己所拟的论文题目去大量地搜集语言材料，检索相关的研究文献，最后写成论文。

研究生仍然是打科研基础的阶段，那一阶段我撰写的近十篇论文，都是研究具体语言现象的，而且有意选择不同领域的语言材料进行研究。如《试论“们”在现代汉语人称代词中的类化作用》（《华中师院学报》1984 年第 1 期），研究的主要是近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材料；《鄂豫方言中的颤音》（《华中师院学报》1984 年第 5 期），研究的是自己对湖北、河南 21 个县（市）的方言进行考察的活的话语材料；硕士论文《存现结构中主宾互易现象研究》（《语言研究》1987 年第 2 期）处理的是现代汉语的语言材料。

在读研究生期间，我从导师那里学习了许多具体的语言学知识，但是终身受益的，是为学之道，是治学之风，是从观察、搜集语言材料到论文写就这一系列环节的严格的语言学研究能力的训练。

叁

中国语法学的历史同西方相比还非常之短。在公元前一世纪，斯多葛学派就建立起了包括主格、宾格、与格、所有格和呼格的“格”体系，亚历山大利亚学派就把词分为名词、动词、分词、冠词、代词、介词、副词、连词等八大词类。而中国语法学从马建忠的《马氏文通》算起还不到百年。《马氏文通》之前，中国只有音韵学、文字学和训诂学，而无语法学。马建忠根据自己对汉语的认识，借鉴西洋语法建立起第一个汉语语法系统。自此以来，几代语法学家根据汉语语法的特点，对《马氏文通》的语法体系进行了大量的“汉化”工作，功不可没。但是，至今这个语法系统尚不理想，其主要表现是：第一，词的兼类和活用现象太普遍；第二，词类和句法成分交叉现象太严重，一个词类可以作多种句法成分，一种句法成分可以由多个词类充当。这起码说明汉语的词类系统和词类划分的效用有问题。

造成汉语语法体系不理想的主观和客观原因很多，其中一个根本性的原因，我认为是对汉语语法的基本事实还不大清楚，有许多语法事实亟待描写和发掘。西方的语法理论之所以可以“花样翻新”，是因为对英语等语言事实的描写较为充分，具有了坚实的基础，而汉语语法研究还缺乏这样的基础。没有这一基础，就不可能有汉语语法学的大发展。“急于求成”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科学的发展是有阶段性的，有些阶段是不可能超越的。

近十几年来，语言学界的一些智者和勇者在忙着建立各种语法的或语言的体系，这是很必要的。但是，我却一直把主要精力放在对语言事实的搜集、描写和分析上。如《论带“了”的三种“(N)A 点”结构》（载《语法求索》，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年），从语义背景的角度描写了“(N)A 点了”、“(N)A 了点”和“(N)A 了点了”三种结构的特点，考察了进入这些结构的形容词的动态用法和静态用法，并根据语义·语法功能把“了”分化为三个不同的单位。再如《NP 场景描写句》（《徐州师院学报》1987 年第 1 期），揭示了在场景描写的语篇中名词性短语可以充当分句的情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汉语的名词性短语与西方语言的差异。

我在对语言事实的描写和分析上，注意不同研究方法的使用。除了使用一般的语言学研究方法之外，还有意识地运用统计学方法和带有实验性质的测试方法。例如，《毛泽东著作设问句研究》（《中国语文》1993 年第 6 期）把观察范围进行人为性封闭，以使用大量的数据统计结果来说明设问句使用的语法规律和语用规律；《词性判定能力的测试》（《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 年第 1 期）运用非谓形容词（或称“区别词”）作为测试材料，设计了四种不同的作业方式，用实验方法

来研究成人的词性判定能力,《中国语文》的记者认为,用这种方法“来解决常常困扰人们的语感问题,不能不说是有启发意义的”(《中国语文》1988年第4期第316页)。

事实研究与理论探索从来就是密不可分的。有一定的理论背景和理论追求,对事实的观察和分析才能深入;对事实的仔细观察和深入分析,才能从中发现有价值的理论问题。我自己的研究追求是,事实研究与理论探索相结合,事实描写和理论解释相结合。每篇论文都要对汉语的语法事实有所发掘,尽力归纳出规律,并对制约事实的规律再作出解释;而且每篇论文都要有一点理论追求,努力把研究上升到理论的层面,希望写出的论文既扎扎实实,且又有沉甸甸的分量。例如《疑问标记的复用及标记功能的衰变》(《中国语文》1997年第2期),把汉语的疑问标记分为四类:A、疑问语调;B、疑问语气词;C、特指疑问词;D、疑问句法结构。并根据分布原则和“同类同级”的补充规则,把这四类疑问标记刻划为上、中、下三个层级,由此描写了疑问标记单用和复用的17种基本格式,总结了疑问标记复用的规律,阐释了因标记复用带来的信息冗余问题。文章还描写了疑问标记功能衰变的若干格式和衰变的若干特点。把事实的分析、规律的总结和理论的阐释三个方面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语法研究的最主要的任务,是揭示语法形式与语法意义之间的对应关系。80年代人们强调从形式入手探索形式与意义的对应,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汉语同西洋语言相比,形态变化相当贫乏,西洋语言中的许多语法范畴,在汉语中有时用语法形式表现,有时用词汇形式表现,有时用语法和词汇等多种形式表现,因此,严格地说,汉语的许多范畴都是语义·语法范畴。这种认识也符合当前国际语言学界出现的从认知和功能的角度研究语言的新倾向。于是近些年来,我开始从语义·语法范畴入手进行汉语语法研究的尝试。国际上对于语言中的空间范畴和时间范畴有了一些研究,我便选择“量范畴”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并以此获得国家“九五”社科基金的支持。

汉语的量范畴与数量表达、等级刻划、序位排列、重叠等都有关系。已撰写的跟“量范畴”有关的论文有《非谓形容词的词类地位》(《中国语文》1996年第1期)、《能受“很”修饰的“有X”结构》(《云梦学刊》1995年第1期)、《论形容词的级次》(《语法研究和探索(八)》,商务印书馆即出)、《形容词的否定式及其级次问题》(《云梦学刊》1997年第1期)、《论词语重叠的意义》(《世界汉语教学》1996年第1期)、《动词重叠的若干句法问题》(《语法研究和探索(九)》,商务印书馆即出)、《双音性质形容词的ABAB式重叠》(《汉语学习》1996年第4期)、《动词重叠与动词带数量补语》(第五次现代汉语语法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即出)、《泌阳话性质形容词的重叠及有关的节律问题》(《语言研究》1996年第1期)等。

这些论文不仅描写了与量范畴有关的汉语语法事实,而且也提出了一些较重要的理论和方法问题。例如:重叠是一种“度量”的重要语法手段;汉语形容词肯定式与否定式的级次与西洋语言的一般级、比较级、最高级不同;语法研究应当把离散性与连续性结合起来;词类内部是非匀质的,词类之间在某一个或某几个维度上具有连续性,这种连续性的序列是由若干过度性的节点构成的;语法的逻辑序列与发生学序列具有对应性,因此,通过可以内部比较的共时性研究来构拟语法的历时发展,提出了语法的“内部构拟法”的见解;句子的节律是由若干顿读的节律构成的,研究句子的节律,有必要先研究顿读的节律。由于这些理论和方法问题是在研究汉语语法事实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因此,没有拿西方理论套汉语事实的“削足适履”之感,而且也会具有较强的生命力。

除此之外,我也写过一些评论性文章,如《〈马氏文通〉新评》(《古汉语研究》1993年第4期)、《语法研究中的“两个三角”和“三个平面”》(《世界汉语教学》1994年第4期)、《汉语语法“本位”论评》(《世界汉语教学》1997年第1期)等。评论性文章虽然写好也挺不容易,但我总觉得撰写分析具体语言事实的文章更难,更见功力。

我的语法研究同师辈相比还显得很幼稚。与许多同辈的研究比也许会显得“土气”和笨拙。但是,我自信立足于本土语言、立足于汉语事实、从事实中生发出“汉味”理论的研究道路是正确的。十几年的语法研究,我最大的苦恼不是对西方的理论了解得少,而是对汉语的事实了解得太少,信手拈来一些语法现象让我说出个所以然来,大都会把我难住。当然,汉语语法研究需要借鉴西方的理论和方法,但是,学术交流是双向的,也需要拿出点自己的理论和方法去影响国际学术界,这样才会使中国语言学在国际上占一席之地。

肆

语言学同行大都知道我在进行儿童语言研究，而且颇多赞誉。不过，我从事儿童语言学的研究，却是在困境中的一次抉择。我在《儿童语言的发展》（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的《束卷语》中是这样描写这次抉择的：

儿时尚武，折柳为枪，与玩伴傲战。激斗完毕，无意插柳溪畔，竟成绿树。我走上儿童语言研究之路，亦属无意插柳。……

我头戴硕士青帽，满怀人类本能的激情，正准备粉墨登场作父亲时，却面临着人生的艰难抉择。我的贤妻白丰兰女士，在她初扮我的未婚妻角色时，就患上了被残酷的医学称之为“死不了的癌症”的类风湿关节炎。我同她在病榻上行合卺之礼，命运就注定我得负起照料妻儿的神圣使命。人非仙魔，无三头六臂。我还能顾得上学术吗？山穷水复，爰其适归？

荒忽困惑之际，读朱智贤先生的《儿童心理学》，竟被书中关于儿童语言发展的叙述所吸引。神经短路的火花，骤然闪想起《语言学动态》和《国外语言学》读时新奇但并不怎么在意的文章。于是，急不可待地跑进图书馆，竟忘记了即将为人父，埋头读起书来：

罗曼·雅可布逊的《为什么叫“妈妈”和“爸爸”》和约翰·B. 卡罗尔的《儿童语言的发展》，令我激动；王嘉龄、伍铁平先生的《斯洛宾：〈心理语言学〉》，Breyne Arlene Moskowitz的《语言的掌握》，伍铁平先生的《雅可布逊：〈儿童语言、失语症和语音普遍现象〉》，涛拍脑海；刘润清先生的《心理语言学诸派及其观点简介》，N. Chomsky的《评斯金纳著〈言语行为〉》，Charles A. Ferguson的《六种语言里的幼儿语言》，陈平先生的《美国心理语言学的一项新研究》，使我遐想翩翩……

过瘾！真过瘾！读着读着，眼睛放出光来。我知道该如何把学术理想与家庭使命怎样溶而为一了。柳暗花明。

我研究儿童语言首先是从记录我女儿的语言发展开始的。在女儿呱呱坠地的当天，就开始记起她的语言日记，有闻必录。当时，我爱人还在河南信阳，她的侄女来帮助料理家务。我爱人和侄女按照我的要求用文字和录音机天天记录女儿语言，并定期把录音寄到武汉或托人带到武汉，由我撰写成文字资料。当时，我们全家收入不足百元，除去生活费用已所剩无几，用节衣缩食省下的钱购买了几盒磁带，因此必须及时把磁带整理出来以备再用。就是用这些资料我写出了《1—120天婴儿发音研究》（《心理科学》1991年第5期）。女儿出生后十个月，在校系领导的关心下，“牛郎织女”得以聚首武汉。我也方得在被华中师大人谑称为“贫民窟”的芦苇为墙的斗室里，在天伦之乐中亲自观察孩子的语言发展。18平米的空间，到处是纸片和铅笔头，随时准备记录。连生活都不能自理的妻子，也把纸、笔放在床头，随时记录下女儿的话语。在到长沙、桂林参加现代汉语教材编写会，或是到庐山出席社会语言学讨论会，我这个暂时卸任的“家庭妇男”，也要带着孩子，以不使记录中断。就这样，我们全家人用原始的办法和超人的毅力，记录了几百万字的儿童语言发展的原始资料。据我所知，世界上不间断地记录一个孩子的语言发展最长的是三岁多一点，而我一直记录到将近七岁。在“七五”和“八五”期间，得到国家社科基金和国家教委社科基金三个有关儿童语言研究项目的支持，使我有机会扩大调查范围，得到更多的第一手研究素材。这些资料给我的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我国的心理学家，如朱智贤、朱曼殊、许政援、林崇德、彭聃龄、缪小春等先生，在儿童语言研究方面已经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而我国语言学界却对这一领域很少问津。但发展心理学是要借对儿童语言发展的揭示，考察儿童心理的发展，儿童语言只是它达到研究目的的一种工具，一个途径。语言学的儿童语言研究，可以借鉴发展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但有不同的研究目的、研究方式和不同的学术兴趣点，需要细致入微地描画一个个音、一个个词、一个个句法结构、一个个语义范畴、一个个复句格式、一个个语段类型的发展，需要去悉心捕捉儿童语言运用的各种各样的发展细节，在此基础上发现儿童语言发展的自身的规律。

在前后十余年里，我（包括与人合作的）撰写出了《汉族儿童问句系统习得探微》（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儿童语言的发展》和《语言理解与发生》（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将出版）三部著作，并发表了《试论成人同儿童交际的语言特点》（《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6期）、《三岁前儿童反复问句的发展》（《中国语文》1990年第2期）、《四岁前儿童“谁”

字句的发展》(《语言研究》1990年第2期)、《儿童反复问句和“吗”“吧”问句发展的相互影响》(《中国语文》1991年第6期)、《儿童习得语言的偏向性策略》(《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乳儿话语理解的个案研究》(《语言研究》1993年第1期)、《论儿童第二信号系统建立的判定标准》(《语言学通讯》1993年1~2期)、《儿童语言发展的连续性及其顺序性》(《汉语学习》1994年第5期)、《独词句阶段的语言特点》(《中国语言学报》总第7期)、《群案儿童的问句理解》(《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等系列论文。

这些著作和论文的研究素材,是用个案的纵向追踪观察和群案的横向实验调查两种方式获取的;在材料的处理上,既有语言学的常规性方法,又有心理学的统计分析方法;在研究思路上,主要是系统的和比较的。所谓系统的思路,一是把儿童的语言发展看作是系统的发展,而不是孤立地分析一个词或一个句式的发展,因此需要考察方方面面的影响,如相关词语或格式之间的影响,认知、文化等因素对语言发展的影响等;二是要一个系统一个系统地研究儿童语言的发展,用力最多的是对儿童问句系统的研究。所谓比较的思路,是把汉族儿童的语言发展同西方儿童的语言发展进行比较,把儿童的语言发展同成人语言的面貌进行比较,把正常儿童的语言发展同有语言障碍的儿童语言发展进行比较,把男性儿童的语言发展同女性儿童的语言发展进行比较,把某一系统的发展同相关系统的发展进行比较,把语言的理解同语言的发生进行比较,把儿童的正确说法同“错误”的说法进行比较,把自己的研究结果同他人的相关研究结果进行比较。通过全方位多维度的比较,寻求汉族儿童语言发展的特殊性和儿童语言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制约儿童语言发展的各种要素。

曾于1995年获得全国高等学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的《汉族儿童问句系统习得探微》,第一次系统描写了汉族儿童五大类21小类问句格式的发展,划分了儿童问句系统发展的四个阶段,探索了影响儿童语言发展的四个方面的要素,发现了儿童使用问句的“S型期望”和以“泛化”、“窄化”、“格式化”为具体表现形式的儿童习得语言的“偏向性策略”,以及因这种策略而造成的相关语言现象发展中的“抑压”、“导拉”、“互促”和“异推”四种发展模式。吕叔湘先生作首席顾问的《中国语言学年鉴(1992)》(语文出版社,1993年)认为此书“由于其观察、分析的细致以及受试者和受试语的汉语身分,对本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将具有一定意义”(第36页)。邢福义教授在该书《序》中称该书是“凤毛麟角”,“做了十分有意义的工作,提出了十分有价值的结论。”伍铁平教授说:该书“是我国语言学界第一部研究儿童语言习得的专著。……对雅可布逊的理论提出了补正”。并认为,该书为心理语言学和心理学的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值得称道”(《语文建设》1993年第11期第8页)。邵敬敏教授说,该书“给语言学界带来了一片光彩。其熠熠之光不仅来自作者数十年如一日呕心沥血的钻研精神,更主要来自《探微》的开创价值和启示意义”,认为“它不仅提供了研究汉语儿童语言发展的相当珍贵的资料,弥补了汉语研究在该领域中的空白,而且丰富了儿童语言研究的一般性原则与理论”(《汉语学习》1993年第5期第48页)。

《语言理解与发生》是《汉族儿童问句系统习得探微》的姊妹篇,是对儿童问句系统理解和发生的全面比较研究。该书在研究方法上三点创新:A、创造了“知识背景剪贴法”,较好地控制了认知因素对语言理解的影响;B、用32个测试句构成一个完整的语篇,既较好地覆盖了汉语问句系统,又使测试具有自然性,有利于测定儿童对自然语言理解的真实状况;C、创造了“话语反应判定法”和“语言参照法”,以便有效地判定儿童的话语理解。该研究发现,虽然语言理解早于语言发生,但理解和发生具有不同的发展节奏,二者基本上交替进行的;而且,群案研究和个案研究两种研究方法具有相当大的差异性和互补性,要全面把握儿童语言的发展面貌,必须兼用两种研究方法。许多儿童语言研究结果相差悬殊,有不少就是因为个案研究和群案研究的差异造成的。这一研究虽然是在问句领域中进行的,但是所发现的一些现象和规律,对于儿童语言习得的一般研究,对于语言与认知关系的探讨,对于儿童心智发展的研究和儿童教育等,都有一定的启示、借鉴意义。

《儿童语言的发展》以汉族儿童语言发展为基本材料,最大限度地吸收了国内外同行的研究成果。该书着力探讨了儿童语言发展的理论问题,对国际上流行的一些理论,如乔姆斯基的“语言先天说”,雅可布逊的“音位发展理论”,皮亚杰的“认知决定论”等进行了评价、修正或反驳。而且还尽力描写了儿童语音、语义、词汇、语法和语用等系统发展的基本面貌。邢福义先生在该书《序》中认为,该书较好地处理了“共性和特征”、“继承和创新”、“事实和理论”、“描写和解释”、

“据点和视野”等五种关系，并认为“能否善于处理研究工作中各种对立统一的关系，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一个学者的成熟程度”。

儿童语言研究，不仅需要有着厚的语言学功底，而且需要有心理学的基础。我是语言学出身，虽然这些年来努力钻研心理学，但搞起儿童语言研究来，仍然是一条腿硬一条腿软。因此，我在妻子久卧病榻的困境中选择儿童语言学，既是聪明的，也是艰难的，艰难就艰难在不能扬长避短。学术界常有“十年磨一剑”之说，但因中国的儿童语言学起步晚，研究素材的搜集需要较长的周期和较多的资金，虽然我进入此领域已逾十载，磨出的剑却仍称不上锋利，所作工作与国外相比仍有较大的距离。

伍

学术的社会使命之一就是要把研究成果投入应用。就某种意义而言，学术研究的价值也就在应用。儿童语言学是具有广阔应用前景的一门学科。首先，儿童语言研究的成果可以为儿童的语言教育和其他教育提供理论基础；其次，在所有类型的语言学习中，如外语学习、聋童语言康复等，儿童语言学习是最为成功的，借鉴儿童语言学习的规律，可以有效地改进其他类型的语言教学。

在对儿童语言进行基础研究的同时，我也做了一些儿童语言学的应用性研究工作。比如，《幼儿语言教学的若干原则》（《幼儿教育》1994年第10期）、《母语获得理论与幼儿语言教学》（同上，第11期）是关于幼儿语言教学的；《语言学习异同论》（《世界汉语教学》1993年第1期）比较第一语言学习与第二语言学习的异同，以为第二语言教学提供改革的参考。但用力最勤的要数聋童语言的康复问题。

大多数哑巴是因聋所致，但他们的大脑语言中枢和发音器官都还是健全的，而且80%的聋童尚存在程度不等的残余听力。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医学、电声技术的发展，完全有可能使大多数聋童获得有声语言，“铁树开花”，让他们回归到主流社会来。我国可以算是一个聋哑大国，0~6岁的聋童就有74万左右，自80年代起我国就开始以政府行为大规模地开展聋儿语言的康复工作。作为一个儿童语言研究者，有义务、有责任为这项具有人道主义和社会发展意义的事业作点贡献。

从1988年开始，我以学术顾问的身份参与湖北省聋儿语言康复中心的工作。首先摸索聋童语言学习的规律，合作发表了《聋童声母获得状况研究》（《语言文字应用》1992年第1期）和《汉族聋童语音发展的规律及对策》（《中国聋儿康复》1995年第1期）等论文。根据聋童学习语言的实际情况，参照正常儿童语言发展的规律，提出了“言语行为教学模式”和“全面康复”的观念（《聋儿语言康复的目标、原则及其有关问题》，《民政研究》1989年第5期；《聋儿语言康复与言语行为模式》，《聋儿康复》1991年第2期），研制出了聋童语言康复水平的测试量表、聋童康复用《现代汉语简化系统》和由三单元28节组成的《聋儿语言康复发音训练操》，并主编了供聋童语训教师使用的《聋儿语言康复教程》（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该书1994年获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中宣部出版局、新闻出版署图书管理司、中国出版者协会、光明日报总编室联合举办的全国首届“奋发文明进步图书奖”二等奖。

陆

大学毕业时，同学们商定，每人在纪念册上都要写一段表白心愿的话。我当时是这样写的：“当年做过文学梦，而今专扣语言门。门开乎？天知晓！”“扣门”已近20年，虽不敢说已登堂入室，但体会还是有一些：

为学难，难就难在需恒怀定性，甘于寂寞，不谋轰动效应，不可急功近利，只能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行。

为学也有快乐，乐就乐在它追求的是真理，虽不能富贵权达但也不必去媚富贵权达；乐就乐在它是一种创造性劳动，可以在方寸之内与古圣今贤和未来对话，可以在充分发挥才智、实现人生价值的同时，为人类的知识库中增加点东西。

学术研究是一种职业，但更是一项事业，是需要用也必须用全部身心乃至生命去从事的一项事业。学术之旅也就是生命之旅！